

# 试析 1970 年代以来的欧洲经济转型

## ——产业结构的视角

孙彦红

**内容提要:**产业结构转型是欧洲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分三个阶段梳理与分析了 1970 年代以来欧洲在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方面最具关键意义的变化,以期为更好地理解欧洲经济转型提供一个重要视角。分析表明,作为欧洲经济结构核心内容的产业结构,始终处于自身积累的“内生动力”与竞争环境变化带来的“外力”共同作用的发展过程中,其整体趋势则由不同时间点上内外力的方向与强度对比所共同决定。总体而言,自 1970 年代以来,欧洲即开启了向“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转型的进程,如今已取得显著成绩;在 1970 年代即露端倪的新技术浪潮中,欧洲还未摆脱整体上落后于美国的状态,能否克服各种结构性“顽疾”对其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至关重要;注重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欧洲经济社会模式逐步形成,对其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未来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后者的方向与内容。

**关键词:**欧洲 经济转型 产业结构 再工业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sup>①</sup>而这两次大转型的直接推动因素都是前所未有的危机,即 1970 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和 2008 年底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此前累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而欧洲应对危机的过程也逐渐演变为全方位、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大转型。在上述两次大转型之间,1990 年代初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节点,因为无论从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从国际经济竞争形势的变化,还是从成员国逐步推进的经济结构改革的角度看,这一时期都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sup>①</sup>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如何界定欧洲的“经济转型”并无共识。笔者认为,如果在某一时期,某经济体在宏观的经济理念与认识、中观的结构性特征、微观的经济活动及其激励机制等层面都发生了重要的、乃至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即可大致认为该经济体发生了“经济转型”,而这种转型往往由经济体自身发展惯性及“内在动力”与重要“外力”的共同作用而促成。本文对于欧洲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分析大体上基于这一认识。

在上述欧洲经济的大转型中,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因为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从竞争力上看,最终创造价值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行为体都是产业;而无论是一体化的不断深化,还是成员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持续推进,最终也都是通过产业这一层面转化为欧盟的经济实力与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欧洲在产业结构转型方面的演变历程,应该是理解 1970 年代以来欧洲经济转型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一个重要途径。鉴于此,本文将循着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这条线索,梳理与分析欧洲自 1970 年代以来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的最具关键意义的变化。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1970 年代以来欧洲产业结构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动当属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即农业与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服务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2011 年,欧盟 27 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比例大约是 1.7:25.6:72.7。总体而言,这一变动趋势几乎发生于战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迁中,是其工业部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体现。鉴于这一趋势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般性”,本文主体部分仅将其作为分析问题的背景,并不做专门论述,而是着重梳理与分析其他更具“欧洲性”的结构变化,尤其关注最重要的生产率源泉——工业部门的转型与调整。

与前文对于欧洲经济转型的粗略时间界定相适应,本文对欧洲产业结构变迁的梳理也分三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自 1970 年代初至 1980 年代末,欧洲开启了战后第一次产业结构大转型进程;第二阶段自 1990 年代初至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是两次产业结构转型的过渡期;第三阶段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欧洲着力推进以“再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本文主体部分将分别以一节的篇幅依次对这三个阶段做较为详尽深入的梳理与分析,第四节是总结与展望,重在提炼出有关 1970 年代以来欧洲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若干基本认识。

## 一 战后第一次产业结构大转型时期:1970 年代初至 1980 年代末

1950 年代与 1960 年代是战后欧洲的经济重建与快速增长时期。伴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欧洲实现了长达 2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高增长与低失业(年均失业率低于 2.5%)大幅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保证了社会稳定。从生产上看,此间欧洲主要依赖于以规模经济为特征的大工业和引进美国的先进技术,而经济一体化促成的标准化生产与市场扩大效应也对工业繁荣起到不容忽视的刺激作用。

自 1960 年代末、1970 年代初起,此前支撑欧洲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此前 20 年经济快速发展所累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推动西欧各国劳动

力成本普遍上升。在法国,经历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工人在大罢工时提出的每周工作40小时、月工资不低于200美元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sup>①</sup> 在意大利,经历1969年的“热秋”大罢工后,制造业工人实际工资在1969年至1973年间快速上涨了36%。<sup>②</sup> 其次,石油危机导致能源成本飙升。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价格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几乎翻了两番(由每桶3美元涨至约12美元),进而触发了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宏观经济环境极不稳定。1973年,以固定汇率制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而后于1976年确立的牙买加体系正式宣布了浮动汇率制的常态化,西欧的汇率市场与汇率制度一时间陷入混乱,战后相对稳定的汇率环境被打破。

伴随着上述变化,欧洲的生产结构与模式也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一,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特点的“福特制”遭遇严重危机。除了前述劳动力与能源成本上升、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等因素之外,技术进步引起的规模经济重要性下降、标准化产品的市场趋于饱和、需求差异化趋势加强、生产与管理模式缺乏灵活性,等等,都使得战后长期支撑欧洲经济发展的大企业面临诸多压力,进入艰难的转型期;其二,此前依赖低价能源与低成本劳动力的工业生产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1973年,世界石油价格平均不到1.9美元/桶。欧洲国家虽然能源短缺,但是仍可通过进口享受充足的廉价能源供应。同时,战后技术含量相对不高的生产方式以及较为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使得西欧企业长期享有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随着能源与劳动力市场情况的剧烈变化,这一生产模式开始承受巨大的转型压力;其三,经济重建后的欧洲越来越面临着在技术进步上与美国直接竞争的挑战。随着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欧美之间的经济竞争性趋于明显。而基于自身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优势,欧洲逐渐能够在前沿技术及相关产业上与美国展开竞争。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如何抓住机遇促进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成为欧洲面临的紧迫任务。

在上述背景下,欧洲开启了战后第一次产业结构大转型的进程。转型一方面是产业与企业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主动调整的结果,另一方面,相关政策的引导与推动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一转型进程几乎贯穿整个1970年代与1980年代,其核心内容与进展可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做出归纳。

第一,从产业组织形式上看,随着“福特制”遭遇危机,为适应新的国际竞争形势,

<sup>①</sup> Daniel Singer, *Prelude to Revolution: France in May 1968*, South End Press, 2002, pp.198-201.

<sup>②</sup> “热秋”之后,意大利于1970年颁布了《劳动者权力宪章》,强化了工会组织,缩短了工人工作时间,同时强化了解雇限制。参见 L.Federico Signorini e Ignazio Visco, *L'economia Italiana*, terza edizione aggiornata, Il Mulino, Bologna, 2002, pp.60-61.

欧洲各国开始尝试新的工业生产模式。作为一种能较好地將生产灵活性与产品差异化结合起来的替代性生产组织形式,基于中小企业水平一体化而形成的产业区和产业集群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一些国家甚至发展成为工业经济的新内核。总体而言,产业区和产业集群的兴起主要是中小企业自身不断探索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寻找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新平衡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发展路径不尽相同。在德国,具有较为浓厚的政府色彩的工业协会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与中介作用。<sup>①</sup> 在意大利,产业区更多的是“积极的自发式增长”,政府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擅长“灵活的专业化”的意大利产业区及“第三意大利”很快发展成为整个西欧经济的新典范。<sup>②</sup>

第二,生产方式开始向节能环保转型。1960 年代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以及 1970 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都为欧洲“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由于传统化石能源短缺,欧洲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尤为严重。此后,节能环保的观念开始迅速传播,最初体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后带动了生产方式的转变,进而在诸多西欧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战略与环境立法中有越来越明确的体现。自 1970 年代开始,德国、英国、法国的企业率先向提高能源效率的生产方式转变,要么逐步退出能源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要么提高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投入。在德国,石油危机后,汽车业意识到能源多样化的重要性,开始研发各种使用清洁燃料的技术;1980 年代,德国政府成立环境与自然保护部,推动了一系列针对汽车业的减排法规的出台,进一步普及了机动车燃料中无铅汽油的使用。此外,德国自 1970 年代即开始探索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欧洲乃至世界新能源领域的先行者。

第三,对于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兴起,欧洲也给予了高度重视,提出要抓住这一轮技术浪潮的机遇。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拉动型转变的压力日益增大,进而对技术进步及应用的要求明显提高;另一方面,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追赶,欧洲在诸多技术及相应的产业环节上已能与美国展开竞争,如何通过前沿性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成为现实

<sup>①</sup> 例如,在中小企业合作研究与建立网络方面,成立于 1954 年的德国工业研究协会联盟(AiF)起到了重要作用。该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为德国中小企业的合作研究提供公共平台,同时组织和协调技术应用大学与中小企业在研发方面的合作。该协会联盟的主要合作伙伴是德国政府,包括联邦经济与技术部、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以及一些州的经济部。参见史世伟:“从国家创新系统角度看集群的创新作用——以德国为例”,《欧洲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57 至 76 页。

<sup>②</sup> 1970 年代,意大利著名产业经济学家贝卡蒂尼(G. Beccattini)重拾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于 19 世纪末提出的“产业区”概念,用以描述意大利的地区产业集聚现象,这一概念沿用至今,参见 Giacomo Beccattini, “Dal ‘Settore Industriale’ al ‘Distretto Industriale’. Alcune Considerazioni sull’ unità d’ indagine dell’ economia Industriale”, *L’ industria, rivista di economia e politica industriale*, No. 1, 1979; 也是在这一时期,另一位学者巴尼亚斯科(A. Bagnasco)在研究意大利产业区发展时提出了“第三意大利”的说法,参见 Arnaldo Bagnasco, *Tre Italie: La Problematica Territoriale dello Sviluppo Italiano*, Bologna, Il Mulino, 1977。

任务。总体而言,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欧洲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由于长期缺乏整体应对举措,<sup>①</sup>传统工业结构的负累,风险资本市场落后,加之福利制度过度发展导致的公共投资趋于消费化、劳动力市场僵化等因素的影响,欧洲在发展以及应用这些技术推动整体产业结构升级上明显落后于美国和日本。欧洲在几乎整个 1980 年代都未能走出滞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累于未能抢占新技术浪潮的先机。

## 二 两次结构大转型的过渡期:1990 年代初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

进入 1990 年代,欧洲面临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与此前 20 年相比开始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就内部而言,欧洲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欧洲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首先,1992 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确定了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目标,1997 年又通过了为保证单一货币稳定而设计的《稳定与增长公约》,欧元的引入进入倒计时阶段。单一货币在大大降低成员国间开展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向其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挑战:成员国开始失去货币政策自主权,财政政策亦受到诸多限制,这使得一些国家之前倚重信贷扩张、货币贬值与公共支出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亟待调整。其次,1992 年底,欧洲内部大市场的第一阶段建设大体得到落实,成员国间货物、资本、人员、服务自由流动的格局初步形成,各国在享受市场扩大与深化带来的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如何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巩固与调整自身产业优势成为各国面临的新任务。

就外部而言,1990 年代欧洲也开始面临诸多变化。首先,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加速,全球产业与价值链迅速重构,对欧洲原有的生产结构与方式构成了挑战。其次,随着 1980 年代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并被视为未来经济发展与竞争力的重要依托。<sup>②</sup>再次,自 1990 年代初开始,主要受益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与应用拉动的生产率迅速提升,美国长达十年的“新经济周期”拉开帷幕,而同期的欧洲却因未能抢占信息技术的先机而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上拉大了与美国的差距,竞争力问题日渐突出。

在上述背景下,欧洲的产业转型开始承受新的压力,也获得了新的动力。具体而言,此阶段欧洲产业结构调整既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前一阶段的内容,也不

<sup>①</sup> 例如,欧共同体层面至 1980 年代初才着手制定支持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的第一个专门计划 ESPRIT 项目,该项目的第一期活动至 1984 年才正式启动。

<sup>②</sup> 在“知识经济”概念广受关注的 1990 年代,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于 1996 年发表一份题为“知识经济”的报告,将“知识经济”定义为直接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之上的经济,并对“知识经济”的内涵及其度量标准做出详尽剖析。参见 OEC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Paris, 1996。

乏新的变化与进展,尤其是以下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欧洲对工业地位的主流认识经历了较大转变。整个 1990 年代,随着各成员国“去工业化”(工业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的进一步发展,<sup>①</sup>特别是“知识经济”概念的兴起,欧盟层面及多数成员国普遍出现轻视工业的倾向,认为工业已是明日黄花,欧盟的竞争力将完全依赖于服务业与研发活动。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基于对此前发展服务业的经验与教训之总结,以及对国际竞争形势的新判断,工业作为最具外向性与创新能力的部门,对于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潜力与保持欧盟国际经济地位的关键作用再次获得认可。从成员国层面上看,包括德、法、英三大国在内的西欧多国开始反思工业的地位,再次重视工业竞争力。<sup>②</sup>从欧盟层面上看,在“里斯本战略”的框架下,尤其是自巴罗佐委员会起,欧盟层面旨在提高工业竞争力的产业政策获得了快速发展。<sup>③</sup>

第二,在产业组织形式上,大企业重新焕发活力,中小企业产业区与产业集群进入调整期,各种新型的生产网络开始形成。经过近 20 年的结构调整,加之 1990 年代新技术(包括自动化、计算机、信息通讯技术等)的迅速普及,大企业在生产与管理上的灵活性明显提高,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为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相比之下,由于在技术更新上资金不足、缺乏关注市场的传统与实力,以及不适应新的商业营销模式等,中小企业与产业集群普遍遇到困难,开始了以“精细专业化”与开拓细分市场为导向的调整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在延续。<sup>④</sup>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快速推进,企业间的横、纵向联系相对于企业规模的重要性不降反升,同时新技术的不断

① 根据 OECD 的统计,世纪之交,欧盟主要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已普遍低于 30%,其中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更降至 20% 以下,而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则接近或超过 70%。

② 在 2003 年春季的欧盟峰会上,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统希拉克和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联名给当时欧盟轮值主席国首脑希腊总理西米蒂斯(Konstantinos Simitis)写信,强调在实施“里斯本战略”、建设知识经济的过程中,工业应该也将会继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并提出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欧盟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工业竞争力的需要。参见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enterprise\\_policy/industry/conference/letter\\_sch\\_ch\\_bl\\_en.pdf](http://ec.europa.eu/enterprise/enterprise_policy/industry/conference/letter_sch_ch_bl_en.pdf), 2014 年 1 月 8 日访问。

③ 2005 年,时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企业与产业委员京特·费尔霍伊根(Günter Verheugen)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直到上届欧盟委员会仍存在一些轻视工业的倾向,……,但是,现在欧盟已认识到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工业仍然在欧盟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远远超出其产值的贡献。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忽视工业基础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乃至社会关系方面非常严重的后果”。参见 Interview with Günter Verheugen, Vice-president and Commissioner for Enterprise and Industry, <http://www.euractiv.com/en/innovation/interview-gunter-verheugen-vice-president-commissioner-enterprise-industry/article-143183>, 2014 年 1 月 10 日访问。

④ 在意大利,自 1990 年代初开始,产业区的发展陷入低谷,生产、出口、就业的整体表现都大不如前,此后开始了以区内企业集团化、生产网络外向化与国际化、发展绿色经济等为核心内容的转型与创新过程。有关意大利产业区近年来的转型背景与内容,可参见孙彦红:“试析近年来意大利产业区的转型与创新”,《欧洲研究》2012 年第 5 期,第 117-135 页。在德国,生物技术、光电子技术及相关产业的集群发展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为其提供了多层次、连续性的支持。有关 1990 年代以来德国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政策与举措,可参见陈强、赵程程:“德国政府创新集群策动的演化路径研究及启示”,《德国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57-63 页。

涌现与应用也增加了多种生产组织形式并存的可能性,由各种规模的企业联系而形成的新型的、开放式生产网络越来越成为一种新趋势。<sup>①</sup>

第三,欧盟层面与成员国的环境政策进一步加强,节能环保的生产方式与可再生能源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1992年签署的《马约》第一次在欧盟条约核心条款中明确将环境保护列为共同体的宗旨与活动之一,大大加强了共同体环境政策在欧盟政策框架中的法律地位。除了规定共同体环境政策的四大目标之外,<sup>②</sup>《马约》还规定“共同体政策必须结合有关环保要求来制定和实施”,要求欧盟制定各项政策时须将高水平的环境保护作为一条重要原则。相应地,一些成员国的环境政策与立法在1990年代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节能环保的观念进一步普及。<sup>③</sup>从产业层面上看,虽然1990年代初大多数欧洲企业对于环境规制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普遍不满,但是随着企业间示范、竞争、合作等各种效应的相互作用,至新世纪初时,欧洲已逐步形成了从整体上应对环境规制生产的新生产模式,大多数企业已适应了“绿色”生产方式。近年来,欧洲企业已在“绿色经济”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先行优势,其可再生能源产业、节能环保技术及产品的竞争力已居世界领先地位。

第四,除节能环保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外,欧洲在多数高新技术上未能取得明显突破,仍落后于美国。由于技术创新与应用环境相对落后,虽然欧洲较早地意识到“新经济”的重要性,但是仍未能抢占“IT革命”的先机。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的竞争力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而技术进步与应用相对落后,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乏力,被普遍认为是拖累其竞争力的“症结”所在。<sup>④</sup>虽然欧盟于2000年提出的“里斯本战略”具有明显的“竞争力”导向,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鉴于前文述及的种种结构性障碍,欧洲在技术创新与应用上停滞不前的局面始终未有明显改观,尤其是在实现将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提升至3%的目标上收效甚微。<sup>⑤</sup>研发创新踟躇不前,显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分析,自1979年以来,欧盟制造业在高技术、中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Reaping the Benefits of Globalization—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2”,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SWD(2012)299final, 2012, pp.172-187.

② 欧盟环境政策的四大目标是保护环境、保护公民健康、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解决地区和全球环境问题。参见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treaty-of-lisbon.aspx?lang=en>。

③ 例如,德国在1994年修订《联邦德国基本法》时在第20条A款特别增加了保护自然环境的内容,正式将环保写进宪法;意大利于1992年拟定了未来十年的环保规划,旨在更好地落实《马约》生效后欧盟层面出台的一系列环保立法。

④ See Bart van Ark, “Performance 2008: Productivity, Employment, and Growth in the World’s Economies”, Research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Board, January 2008.

⑤ 在研发投入方面,“里斯本战略”设定的目标是至2010年时将研发投入占欧盟GDP的比重提升至3%(2000年时这一比重约为1.9%)。然而,欧盟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并未取得预期进展。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欧盟研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2.01%,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2.73%和3.25%。

等技术、低技术部门的附加值分布结构几乎未发生变化,其优势一直体现在中等与中-高技术部门,进入新世纪后甚至出现了高技术部门附加值比重下降的趋势。<sup>①</sup>

### 三 新一轮产业结构大调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

2008 年底以来,欧洲相继遭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强烈冲击,至今仍未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鉴于此次危机的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以及持续时间之久,欧洲试图摆脱危机、实现复苏、寻觅新的可持续增长通道的过程正在日益演变成为一场经济结构大转型。这一转型不仅关乎其能否尽快走出危机阴霾,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以何种地位和姿态参与后危机时代更加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就产业结构的转型与调整而言,欧洲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首先,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层面及西欧各国对工业与服务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及其各自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反思,之前过于倚重服务业与虚拟经济的态度有了更加明显的转变。工业的地位进一步得到认可,相应的政策也更加受到重视。在欧盟委员会 2010 年 10 月发布的产业政策通报“全球化时代的产业政策”中,开篇即提出:“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的欧洲都更加需要工业,而工业也更加需要欧洲的支持”。这是因为“金融与经济危机使人们又一次认识到,一个强大的、有竞争力的和多样化的制造业对于欧盟竞争力和就业创造具有核心重要性”。<sup>②</sup>

其次,如何抢占“新工业革命”的先机成为欧洲面临的新课题。近几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在欧洲和美国兴起并迅速向全球传播。欧盟委员会于 2012 年上半年正式提出“新工业革命”的说法,认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性变革将由绿色能源、清洁运输、新生产技术、新型材料以及智能通讯系统等引领,并将最终改变世界工业版图。基于这一战略判断,欧盟强调必须抓住新的机遇,以弥补此前未能搭上“IT 革命”头班列车的损失,在未来的国际产业竞争中抢占制高点。

再次,如何借助产业结构升级摆脱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开启新的增长通道成为欧盟面临的迫切任务。随着债务危机导致的政府财政纪律不断加强,当前可用的宏观经济刺激措施捉襟见肘,欧洲寻求通过结构性手段实现经济复苏与增长的意图

<sup>①</sup>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Accompanying the Document “Strategy for th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and Its Enterprises”, SWD(2012)236 final, 2012, pp.21-22.

<sup>②</sup> European Commission, “An Integrated 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Globalisation Era—Putting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at Centre Stage”, COM(2010) 614, Brussels, October 2010, p.1.



愈益明显。如果说金融危机前的“非理性繁荣”<sup>①</sup>延误了欧洲切实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努力的话,那么过去几年的危机“洗礼”则使得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朗。

在此背景下,欧洲进入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新阶段,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当属“再工业化”战略的提出。该战略出台的标志是欧盟委员会于2012年10月发布的产业政策通报“指向增长与经济复苏的更强大的欧洲工业”。<sup>②</sup>简言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该战略的核心内容。

第一,欧盟“再工业化”战略提出,通过新工业革命扭转工业比重下降趋势,设定了到2020年将工业占欧盟GDP比重由15.6%提升至20%的总体目标。这表明,欧盟已由新世纪之初对“去工业化”的担忧逐步发展为如今的“再工业化”,工业的地位被提升至战略考量层面,凸显了其推动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上某种程度的“质变”。

第二,虽然总体目标带有明确的指标性,但是欧盟“再工业化”战略并非简单地基于现有产业结构提高制造业与工业比重,而是试图推动一批新兴产业诞生与发展,同时加强对已有产业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核心在于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重构工业与制造业产业链。

第三,欧盟“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计划较为全面系统,实施框架也大体符合欧盟当前的工业与宏观经济现状。欧盟委员会围绕在危机冲击后的低迷经济形势下“如何启动投资”、“如何将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做了大量研究,并据此为“再工业化”战略设计了一套包含“四大支柱”与“六大优先领域”的实施框架。“四大支柱”分别是鼓励新技术研发与创新、改善市场条件、增加融资机会、培育人力资本与技能转型;“六大优先领域”分别是旨在实现清洁生产的先进制造技术、关键使能技术、生态型产品、可持续的建筑材料、清洁运输工具和智能电网。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委员会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前后,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也纷纷提出各自的“再工业化”计划。尤其是作为欧洲经济领头羊的德国,上至联邦政府、下至各类企业对以新能源为导向的“新工业革命”的践行,为其他国家做出了表率。德国联邦政府于2010年9月推出的“能源方案”长期战略(Energiekonzept der

<sup>①</sup> “非理性繁荣”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欧洲多国过分倚重金融、房地产以及相关服务业的快速膨胀来拉动经济增长,并未给予实体经济和工业以足够的重视,最终导致经济泡沫化。欧盟委员会对此有过专门的评价。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Accompanying the Document “A Stronger European Industry for Growth and Economic Recovery”, SWD(2012)297 final, Brussels, October 2012, p.16。

<sup>②</sup> European Commission, “A Stronger European Industry for Growth and Economic Recovery”, COM(2012)582 final, Brussels, October 2012.

Bundesregierung) 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该国向“新工业革命”全面进军的宣言。<sup>①</sup>

整体上看,欧盟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既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又面临着诸多挑战,执行效力与效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从基础与优势上看,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基于理念与实践上的长期准备,欧盟“再工业化”战略目标明确,推进计划较为全面系统,符合“新工业革命”对系统性变革的要求;第二,在节能环保与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欧洲具有较为坚实的民意与技术基础,且在一些领域已获得了先行优势;第三,化学、机动车辆、航空与机械工程等部门将是以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先进自动控制技术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工业革命”的主要发生部门,而欧洲在这些部门的既有优势是推进“再工业化”的坚实基础;第四,整体上看,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德、法、英、意等主要经济体)擅长专业化生产与开拓细分市场,同时具有渐进式改进已有工业技术、并将之与传统手工工艺及文化元素等相结合的突出能力,因而其产品与服务易从专业化、质量、环保、品牌、设计、个性化定制等方面获得高附加值。这是欧盟推进“再工业化”的独特优势;第五,规模达 5 亿人口、且集中了全世界约一半的“高端”需求的内部大市场也是欧盟的另一优势。

就欧盟面临的困难与挑战而言,以下两个方面最为重要:第一,危机带来的困难是欧盟推进“再工业化”的最直接障碍。目前欧盟工业产出仅相当于 2004 年的水平,即便是受危机冲击最小的德国,其工业生产至今也未恢复至 2008 年的危机前水平。究其原因,正是持续、反复的危机不断加剧了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消费信心与商业信心之间形成了相互抑制的“死结”,工业投资复苏障碍重重。第二,就科技创新与应用的环境而言,欧洲存在诸多不易摆脱的结构性弱点。“再工业化”的核心是促进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而欧洲在这方面至少有两点难以克服的关键性“不足”:一是研发投入长期不足(在当今世界研发总支出中,欧盟占到 17%,而美国一家就占了 31%);二是科学研究成果商业化的能力不足。<sup>②</sup>另外,整体上仍然僵化的欧洲劳动力市场也不利于劳动技能的及时转型。

虽然具体落实困难重重,但是欧盟层面及成员国的“再工业化”战略的确勾勒出了未来若干年欧洲产业结构转型的大方向,对产业与企业的具体行动发挥着重要的指

---

<sup>①</sup> 该方案提出,至 2030 年将可再生能源占德国最终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提升至 30%,至 2040 年提升到 45%,2050 年提升至 60%,从而正式进入以新能源为主导的“后碳时代”。该方案具体内容可参见德国政府网站:<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StatischeSeiten/Breg/Energiekonzept/dokumente.html>,亦可参见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经商处的相关述评,<http://de.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105/20110507559839.shtml>。

<sup>②</sup>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统计,2012 年美国每万人居民申请专利数为 8.56 件,同期欧盟仅为 2.19 件,其中最高的德国为 9.02 件,略高于美国,其他主要成员国的表现均不容乐观:法国 3.72 件,英国 3.18 件,意大利 2 件。

导与协调作用。

#### 四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作为欧洲经济结构核心内容的产业结构并非静态事物,而是始终处于自身积累的“内生动力”与竞争环境变化带来的“外力”共同作用的发展过程之中,其整体趋势则由不同时点上内外力的方向与强度对比所共同决定。简言之,“内生动力”既包括欧洲在产业结构演变上的发展惯性与内生活力,也包括欧洲在不同时期旨在升级产业结构的重要政策取向;“外力”则可概括为日益加速的全球化带来的内外经济竞争环境的重要变化。总体而言,自1970年代以来,欧洲在产业结构转型与调整上既取得了诸多成绩,也存在不少阻碍产业结构顺利升级的“顽疾”。就理念与政策取向的变迁而言,既有一以贯之乃至不断强化的内容,亦有某种程度的“改弦更张”,体现了欧洲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不断探索、创新、反思与调整的过程。回顾最近40多年欧洲的产业结构变迁历程,可以概括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认识。

第一,欧盟层面及其多数成员国对工业经济地位的主流认识经历了较大转变。20世纪70、80年代,虽然工业占GDP比重开始迅速降低,但是欧盟整体上对于工业仍保持着高度重视;90年代,随着“去工业化”的加剧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欧盟层面及多数成员国普遍产生了轻视工业的倾向;进入新世纪之后,工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与保持竞争力的关键作用再次获得肯定;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进一步触动了欧洲对于工业与服务业关系的深刻反思,工业的地位进一步得到认可。由此可见,近两年欧盟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并非一时起意,而是基于过去几十年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及相应的认识转变做出的战略决策。

第二,从产业组织形式上看,自二战后大企业占绝对主导,到70年代之后中小企业产业区与产业集群获得较快发展,到90年代大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再到近年来由各类规模的企业通过横、纵向联系而形成的各种新型生产网络迅速发展,欧洲一直在生产组织形式上不断探索与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为现代工业模式多样化所做的贡献不容忽视。

第三,自1970年代以来,欧洲在产业结构上即开启了向“绿色经济”转型的进程,近年来又提出“低碳经济”这一更具丰富内涵的概念,并将其确立为未来的长期发展目标。如今,节能环保与开发可再生能源的理念在欧洲已深入人心,在实践上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欧洲多国(包括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等)的节能环保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已具有世界领先优势,一些领域走在了美国的前面,并日益成为其竞争力的新源

泉。总体上看,欧洲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绩构成了其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坚实基础。

第四,在 1970 年代即初露端倪的新技术浪潮(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中,与美国相比,欧盟至今未摆脱整体上落后的状态,这与欧洲在技术创新能力与环境(包括创新文化的相对缺失、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缺乏活力的金融市场)上的落后密切相关。时至今日,上述结构性弱点仍是欧洲产业结构升级的沉重“包袱”,能否克服这些“顽疾”是其能否顺利推进“再工业化”战略的关键所在。

第五,1970 年代以来,注重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欧洲经济社会模式逐步形成,且对其产业结构转型与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sup>①</sup> 长期以来,欧洲企业擅长从质量、环保、品牌、设计、个性化定制等方面获得高附加值,即是其经济社会模式的重要体现。另外,当前正在推进的“再工业化”战略强调可再生能源与先进制造技术齐头并进的发展思路,也体现了该模式的重要影响,具有典型的“欧盟特色”。目前看来,虽然近年来这一模式面临着调整压力,但是其核心价值观已较为稳定,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与内容。

诚然,较之本文的梳理,过去几十年欧洲产业结构转型的具体进程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鉴于篇幅与笔力所限,本文只是大体勾勒了 1970 年代以来欧洲在这方面最具关键意义的变化与进展,以期对全面深入地理解过去 40 多年来的欧洲经济转型历程有所裨益。

就目前而言,“再工业化”显然是欧洲正在发生的经济结构大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再工业化”能否克服困难得以推进,不仅关乎欧洲自身能否夯实并立足于既有优势,追回过去几十年在高新技术领域“失去的机遇”,为重振欧洲经济找到关键支点,也将对世界工业版图的重构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鉴于此,无论出于把握欧洲经济发展前景还是中欧经济关系的考虑,对欧洲“再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跟踪与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孙彦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责任编辑:宋晓敏)

<sup>①</sup> 近几年国内有关欧洲经济社会模式的较为系统深入的剖析,参见罗红波主编:《欧洲经济社会模式与改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